

鲁迅先生纪念集

第二辑

忆鲁迅先生

[日]内山完造

十月十八日午前六点钟左右,许夫人来了,带来一封如今已经可悲地成了绝笔的先生的信。

老板:

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拜托你,请你打个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替我办!

草草顿首

L 拜十月十八日

“原来在十点钟的时候,是有一个约会的。”一面看信,一面听着许夫人的话,我的胸里感到一种难言的悸动。

时常总是写得齐齐整整的信,今天,笔却凌乱起来了。我马上打电话给须藤医生,请他就来。随后我就跑到先生家里去了。那时候,先生坐在台子旁边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但,脸色非常坏,呼吸好像也很困难。我告诉他,须藤医生马上就会来。那藤椅就是先生最近时常坐在上面的一张躺椅。

先生的呼吸看起来好像异常困难,我静静地把他的背部按摩着。许夫人也同样地在按摩,但一点也不能够平静下来。在我的家里藏有治哮喘的药鸡蛋油,有一次我曾问过先生吃不吃,但先生却说是不必,所以也就没有吃。可是,今天,我觉得或许要吃也未可知,所以,不管妻说“不行,先生决不会吃的,”我还是把装在胶袋(Kapsel)里面的药拿了六管来,作为须藤医生来到之前的治疗。我就问先生吃不吃?先生说:“唔,吃吧。”于是,我马上揭开胶袋的盖子,拿到先生的嘴边去,先生就

一口气吃了三个。我很高兴，心中私自祈求它能够奏效。

我要先生稍为睡一下，先生却说，一躺下来就很不自在；因此，还是坐在椅子上，有时把身体摇摇，并将上半身伸直。我看着，也觉得他的确很不自在。我们要他停止吸烟，他终于把吸剩的丢了。当我跟许夫人都在按摩着他的背部的时候，须藤医生就来到了。须藤医生一踏入房门就用那好像要把先生看个透彻的姿势跑了进来。当我在那完全用家乡话说着“怎么搅起的？”的医生脸孔上面，明明白白地看到忧色时，我就不得不一个人在心中私自祝祷着。

先生从很困难的呼吸当中，用断断续续的话语，说：“从今天四点钟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请快替我注射。”那时候，医生已经把注射的手续准备好了，马上就在右腕上打了一针。

可是，先生的呼吸好像还是很困难。过了一两分钟，先生说：“怎么搅起的，总是没有效果。”

医生虽然说再过一两分钟再说，但也还是在作着第二回的注射准备。并且说，如果一针不见效，就再打一针。已经过了五分钟了；但先生的呼吸并没有变化，依然还是很困难；因此，医生又在右腕上面作了第二次的注射。过了一二分钟左右，先生就说好像稍为好点了。呼吸，也好像显得比较舒服些了。我和许夫人都不知不觉地松了一口气，几乎同时地开始按摩着先生的背部；但先生要我们停止，我们这才一同停止了。先生的苦闷稍为和缓了一点，跟须藤医生开始讲起话来了。这时候，恰好是八时前五分。我因为八点钟在店里有个约会，就拜托了须藤医生，回到店里来了。什么通知也没有，我以为已经不妨事了，就安心地跟来客谈话。可是，这时，须藤医生来了，说是不但哮喘总没有好，而且好像已经变成心脏性哮喘。因为想要请松井博士诊察一回，所以就马上把汽车驶到福民医院去接松井博士；但，偏巧博士今为礼拜天的缘故，不在家；问到了他的去处，须藤医生就亲自去接他。这时候，石井医生偶然地跑来了，把先生今天发病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就走了，说是马上要去问候一下。

过了一会，须藤和石井两医生回来了，说是病很重，今天须得十分注意。不，他们还说好像很危险；但我不能够对许夫人说这些话。我把

看护妇叫了来，吩咐她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法，每隔两个钟头注射一次，呼吸困难的时候，就作酸素吸入。我马上准备好酸素发生器送去；一面叫药店准备酸素管；然后就先行用酸素发生器施行吸入。那时候，先生已经睡在床上；酸素的吸入，看起来似乎多少使呼吸舒服了些，于是，先生就说起话来了：

“我的病究竟怎么样了！”

我就对他说：最好是静静地休养；医生也说是要让先生静静地休养；所以，请你还是不要想各种事情，好好地休养一下。这当儿，酸素管已经拿来了，就再行准备酸素管的吸入。看起来，酸素管的吸入倒很不错，先生好像能够安睡了。在这以前，我为顾虑万一起见，曾对许夫人说，病势很重，有注意之必要；并打电话叫先生的令弟建人先生来。他马上就来了。须藤医生说了一声大概不妨事，明天再来，就回家去了。但我总觉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个店员住在先生的家里。

于是，我也就先行回到家里来，但总觉得不放心，所以，再把石井医学士请来诊察。结果，说是病势很重，还是叫先生的令弟来好；因此，我又叫人打电话请建人先生来。一会儿，建人先生来了，我就把医生的话告诉他，请他注意。当他跟我在楼下的客堂间谈话的时候，许夫人惦念着我，劝我回去休息。但我总觉得不放心，却又没有把这话说出来的勇气；只得绕着弯儿，说是打算跟建人先生谈到天亮。但夫人却非常操心地说：“先生也很安静的，还是请你回去吧（请建人先生也在楼上休息）。”我觉得使夫人操心也于心难安，遂于晚间十二时半动身回家了。

我不是神仙，自然无从预知那竟会变成跟先生的永诀！

回来后，我就把先生的情况告诉那还没有睡，正在等着我的妻；一面祝祷不要有什么急变，一面就寝了。但我的神经非常兴奋，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翻来覆去的苦闷着，只是祝祷先生能够平平安安地直到明天。午前五时的钟声敲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了老板老板的喊声。我吃了一惊，跳了起来，把窗子打开。“请你马上来！并且请你马上请医生来！”于是，我当即叫用人去请石井医生和须藤医生马上来诊视；然后，我就急跑到先生家里去。那是午前五时五十一分。可惜——

先生的额还温暖，手也还温暖；但呼吸已绝，脉搏也停止了！我用

一只手握着先生的手，一只手按在先生的额上，温味渐渐地消失下去了。许夫人靠着台子悲泣着，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语，只是跟她一同悲泣。石井医生来了，但已经“没有法子”。接着，须藤医生也来了，但也“没有法子”。不管怎样地夸耀着文明的医术也还把它没有办法。那就是生命。

我马上就通知鹿地夫妇及其他的人们：

“呜呼哀哉！鲁迅先生长逝矣！时为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五时廿五分。”

“我的病究竟怎样了！”这一句话，将永远不会从我的耳朵里消失去吧！“人生如朝露”，“人生如梦”，实在不是虚语啊！

现在，我打算就记忆之所及，把先生平日的谈论之片断记录在下面：

“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

听着这十分愉快的漫谈，还是最近的事情。

“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

听见我这么说着，先生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老板，如果想要晓得自由人的标本的话，那只要知道帝王的生活就行。那才十分自由呢！”

“老板，今天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呢。”

“我曾在商务印书馆的西书部预定德文书。昨天来了通知，说是预定的书籍已来，可以带四块五角钱去领取。我以为那大概是运费，加上书钱，总要五六十元。刚才我就准备了这笔钱去领取。伙计把预定的书拿出来了，要我付四块五角钱。我问他这是什么钱。他说，这就是书钱。于是，我就对他说：没有那样的事情，这书无论如何也要四十多块钱，请你再细查一番。但他还是说：不，四块五角就够了。我又对他说：这的确不对，这是四十马克的书籍，我想中国钱无论如何也要四五十元

左右,所以还是请你查查看。但那位伙计先生却说是:麻烦透了!你可以不必那么!你如果要,就付四块五角钱拿去,如果不要,那你就回去吧。

“我自然是因为必要,才去预定的。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已经‘万事休矣’。我就付了四块五角钱把它拿回来了。商务印书馆赚不了钱,乃是当然的事情哩。

“跟这相同的事体到处都可以看到。无论在邮政局,在火车上,在轮船公司里,在商店里,在旅馆里都可以看到。我也曾在各处碰到过好几回。”

“老板,你也晓得的那位爱罗先珂曾经说得好:‘日本人很听从,遵守上头的人所说的话语,官吏尤其是这样,所以,是一个最便于施行政治的国度。中国人却恰好相反,对于人家所说的话语,首先就加以怀疑。尤其是官吏所说的话,是颇为靠不住的。所以,中国乃是个最难于施行政治的国度。’

“我也觉得,这是实在的情形。

“例如长官对一个警察说:这是一个恶人,(对于日本人,不管他是否一个罪人,只要被警察署叫去审问过一回,似乎就已经决定他是一个罪人;因此,一个给警察捉去了的人,就光是这一点,也已经可以完全决定他是一个坏人。)那么,警察的自我意识就完全不会活动。不,应该说是:他不会使自我意识活动起来去研究那个人。他只是跟长官所说的一般地把这个人决定为坏人而加以处理。这似乎是在把长官的话不折不扣地完全相信着。

“在中国,则完全相反。虽然长官说这是个罪人,是个极坏的人;但人家决不会相信他的说话。虽然因为是长官的命令,所以要把他当作罪人来处理;但他一定会让自我意识活动起来,一定有着别的看法。

“他一定会有着自己的见解,譬如:这个人为什么是个罪人?为什么是个极坏的人?这总不像是一个罪人,也不能把他认作一个坏人之类。

“这就是日本易于完成其统一,中国却难于统一的大原因。”

“老板,在日本,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把母乳给他吃的吗?”

我说:

“不,也许因地而异;但,据我所知;最先是把叫做‘五香’的东西给他吃,然后再让他吃母乳。”

“啊,原来如此。‘五香’是什么,我可不晓得。但那种习惯却跟我的故乡(浙江绍兴)的习惯很相像呢。

“在绍兴,小孩子生下来,在吃奶以前,要先让他尝五种东西。第一是醋,第二是盐,第三是黄连,第四是钩藤,第五是糖。

“是从第一种开始,照次序叫他尝下去的。醋是酸味,盐是咸味,黄连是苦味,钩藤乃是人生的刺(荆棘),即是痛苦;最后才给他尝尝人生的甜味。

“中国人处理小孩子的顺序,从这件事情看来,也就很可以了解了吧。

“把人生的甜味摆到最后,这大概就是跟日本人的处理方法的相异之点吧。”

这是一个普通的习惯和形式;但却含有教训的意义。

“老板,你以为胡汉民到不到南京来?”

“我不晓得。政治家的动向,对于我是没有兴趣的,所以,我还没有想过哩。”

“那末,×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

“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

“那我们就不能赌输赢啦。

“这且不去说他,这样的時候,中国的大众是很担心的。因为吸饱了血液的臭虫,肚子已经膨胀着,再也不会吸得很多了,所以,稍为能够放心。但,新的臭虫,却还没有吸血,是个空肚子的家伙。这空肚子的家伙一跑出来,那最后的吸血是很厉害的,哈哈……”

这是多么奇妙的譬喻呀!

“老板,在同样的吸血的家伙当中,我最讨厌蚊虫。嗡嗡……的噪

闹着,真讨厌!

“臭虫这家伙就颇为可爱。一声不响地吮吸着,肚子吃胀了就连动也不能够动地滚来滚去。这些地方,却很有点滑稽味呢!”

有一天。那是当先生卧病了三个多月的很凉快的时候,先生用很大的声音叫着“老板”,这种过分的突然,使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是病后的第一次。

“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试行出来走一走。

“前几天从南京来了一个客人。他是特地跑来探问我的。是个从前的学生。十分惦念着我。今天又从南京寄来了一封信。信里头说着这样的话:

“‘先生的通缉令自从发表以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因为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关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恐怕做了之后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

我就问先生,那末,你是怎样回复他的呢?

“我因为很寂寞,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我们很可以看到先生在讲完了这段话时的眉目的跃动。

“老板,你看了报吧?”

报上载着:×××五十六岁的诞辰,祝贺的钱竟收到十余万之多。我想,恐怕没有人把这件事情看作不可思议或是发生怀疑的吧?

我觉得很伤心。原来在中国,庆祝寿辰,每隔十年一回:如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或八十岁……等等;跟这个人一样地庆祝五十六岁的习惯是没有的。所以,我想,这个人一定是每年都在祝寿,并且,每一次祝寿,也一定可以收到这么一笔大款子。逢着每年的诞辰都可以收到十万块钱,这真是厉害!

“从前的受贿,都是很秘密的;但,如今,则贿赂似乎大抵都变成公然的了。”

到现在,我都还可以想起先生当时的脸孔之变得非常阴郁。当我去探问卧病中的先生的时候,先生还对我讲过这么几句话:

“老板,《海上述林》的校样还没有拿来吗?已经是十月了,他们究竟在干着什么事?五月间就约定要打纸版的呀,真是‘马马虎虎’没有办法。我已经写信去了。

“我说:‘翻译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尔基也于最近去了世,编辑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虽然如此,但书却还没有校完,原来你们是在等候着读者的死亡的吗?但,并没有回信。”

曾经作过这种叹息的先生,仅仅看到了上卷,终于还没有看见下卷的完成就长逝了。这恐怕也是遗憾之一吧。可是,下卷已经拿去印刷了,我想,最近总可以完成了吧。

先生真是一个不肯马虎的人物。跟人家约定了碰头的时间,一定会准时来到。对方如果迟了半个钟头,他就常常会说:马马虎虎,真不好办。

有人曾经把先生秘藏的外国书借去,并且送回来了。可是,多么暴乱哟!书页弄得皱得不成样子,美丽的插画,也通通弄脏了。

看着先生当时的悲苦的脸孔的我,也觉得十分不安。先生并不是在悲叹书籍的被弄脏,而是无论何时都在悲叹着那把书弄脏了的人心的污浊。

每当碰着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时常为崇高之感所打动。

“老板,你晓得‘黄河之水天上来’吗?治理黄河的方法,并不是疏浚河床,而是把两岸的堤防渐渐地加高的。

“河床年年为泥沙堆高,因此两岸的堤防也渐渐地高了起来。大水一来,高筑的堤防在什么地方一溃决,水就会跟瀑布一般地流下来。

“于是,黄河之水就从天上来。

“中国实有把这种治水方法加以革命之必要呢?”

从先生嘴里说出来的许多话语,简直是千古的金言。不幸由于我

的头脑很坏,并且人又疏懒,没有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实在可惜!

“老板,道路这东西,并非从开头就有着,都是由人去走成的。”

先生曾经这么说。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非常明了,他决不妥协。

在政治的,生理的,和反对者的三重压迫下面,不屈不挠地战斗过来的足迹,我觉得,决不能让杂草将它覆蔽了的!

让那足迹变成大道,难道这还不是后来者的责任吗?

(1936年11月15日上海《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鲁迅先生

[日]内山完造

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的电车路，着着地向北伸展，成了近年来成为问题的越界筑路。靠近电车的终点，有日本小学啦，福民医院啦，等等。福民医院的对面，有一个陈旧的，叫魏盛里的小衙堂。房子只有七幢，全部住着日本人。我借了那弄口靠右边的两幢，把它打成一所使用着。进出就用着那原来的两个石库门。小天井上全部盖了玻璃，作为采光之用；可是里面依然阴暗，几乎日中也开着电灯。在那电灯底下，有七八张沙发和椅子围着一张小桌子，那就是所谓“漫谈席”。凡有空暇的人或者疲累了的客人，谁都可以坐下来，喝喝茶啦什么的，一边宽荡荡地看看书，谈谈话。

那时候，听说从北平受厦门大学之聘，去任文学的教授，而又转任广东中山大学文科主任的鲁迅先生，愤慨于——

政府既叫人家向鲍罗廷，加仑等等那一些顾问致最敬礼，非常地礼赞俄罗斯，拼命派遣留学生到那边去，然而一方面又乱杀那些留过学回国来的青年的那种暴乱的态度，说着：

“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走。”而愤然离开中山大学，到上海来了；可是我们夫妇俩，因为一次也未曾见过面，一点儿也不认识先生。

此后不久，就有一个常常和二三个朋友同道着，穿蓝长衫的，身材小而走着一种非常有特长的脚步，鼻下蓄着浓黑的口髭，有清澈的水晶似的眼睛的，有威严的，那怕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的人，映上了我们的眼帘。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种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去。”

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掉了；当时，我立刻就问：

“尊姓？”

一问，那位先生就说。

“叫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从此，在执笔得疲乏了，或是看书看倦了的时候，就荡过来。把许夫人介绍给我们，是稍后的事。先生真是一位豪爽坦白的人。他一天天地和我们亲密起来，几天之间，我们心里便已没有了所谓客人的意识。那时，先生也常常被一些不清楚的客人错认做掌柜的而大笑起来。

可是他随便什么时候，总以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他把我当作掌柜的了。”这么告诉我们。决不不高兴什么的。

有时，一些认识先生面孔的学生什么的来了，他们不客气地望着他细声说“鲁迅”“鲁迅”于是他就——

“喔，又来研究我了。哦，回去吧，”说着，就拿起帽子，匆匆地出去了。

许夫人和我们，因为言语上的关系，没有多多交谈，不过和我们之间，大家心中都很了解。

不知不觉，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其间，先生的身边常有危险，先生却很坦然。

在国民政府下通缉令等等的时候，也一径是满不在乎，好像完全不知道那么一回事似地来来去去。

我们担心着，“先生，危险哪，暂时躲一躲怎么样？这么一说，他就——

“不，不要紧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啦什么的了。”

“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

他真是平平淡淡满不在乎。

可是因为夫人担着心，我们也就劝他，曾经强迫地要他避过一时难。

他和蔡元培先生，宋庆龄先生，杨杏佛先生等等组织人权同盟的时候，在日本人之间，好像传言说那便是共产党的团体似的；那是完全错误的，实在——

是因为标榜着法权国家的国民政府当局，以太不合法的行为活葬人命，是为要矫正这种不合法而组织的团体。要之，所谓人权同盟，是拥护人民生命权的一个团体的名称。

可是随着这同盟的活动在表面上的得势，便显露了如国民政府的敌国之观。还不知道是故意呢，是偶然。

正在那个时候，杨杏佛先生在这人权同盟本部的门前被暗杀了。那消息一传来，先生便立刻赶上汽车，飞奔到本部去。

后来，许夫人也非常担心，曾经到我的店里来，等待先生的回来。

是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把许夫人的心衷和我们的忧虑向他一说，他便说，“管它呢，就是被杀死了，也打什么紧呢？”他颇不以为然；但是，实际的情形，似乎危险非常紧迫，因此又强迫地要他避了难。

回忆是无尽的，不过小的事情现在我不说。

已经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我桌边的椅子（先生的定席），已成了徒然引起我泪水的遗物！

鲁迅先生已于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廿五分长眠了！

改造社社长山本先生来了三通电报；最后一通，是叫我写一篇与先生的交游记（或者是交友记吧？）的豫约，我打了个回电说“好”，就担任了下来。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期间，有一万人光景从朝到晚作着长蛇形的行列。二十二日的出殡，虽说是下午两点钟，可是从早晨就开始拥塞进来的群众，围绕着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走路都没有的。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豫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男女和少年。旗子挽联，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罢，拿旗子挽联的也罢，全部是送葬的人。

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有,一切都由八个治丧委员办了。这等等,毫无遗憾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两小时半的大行进,一丝未乱,什么事故也没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开始放射青辉到礼堂上的下午六时了。

“哦,答应下来的责任是非尽不可的。”

我这么想着,便提起钢笔,坐到了桌子面前;可是一点儿也写不出来,不知怎的,好像统统忘记了。

终于,一天工夫一行也没有写。心想今天算了,从明天写起吧,便掷下了笔,洗一个澡睡了。

“但愿今天”,心里这么想着,又拿起笔,坐到了桌前,可是依然不行。一句也写不出来。

着急了之后,就想,原来山本先生是叫我写交游记(假定不是交友记)的,而所谓交游记,要写点什么才好呢?先说这事情我就一点儿也不明白。因为是叫交游记,那末一定是应该写一块儿游玩的事情的。譬如说,是应该写某年某月到某处去看梅花啦,某年某月玩洞庭湖啦,这等等的回忆的吧。一个人刚这么想定,无奈真是不巧得很,那么样的风流之游或旅行,我和鲁迅先生几乎从未有过。而第一,资格先就不够,但是既经答应了下来,如今再去回绝,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此,挨骂也好,被人家笑也好,打算把我能写的东西写出来。请各位容忍我吧。

我这个家伙,实在生来就是个不风流的人,天明也罢,天黑也罢,总归在堆积着的书架当中,守着那张长五尺宽三尺的桌子,左边电话听筒,右边钢笔,是一副那么的腔调,过着三百六十五天的,先生说:

“老版(把版字当老板写的,只有先生一个人)。

“老版,怎么样?你这样子早晨忙起忙到晚,不歇歇工作休养休养,是要生病的呢,哈哈哈哈哈……”他这么笑着,我也就……

“好,好,那末,我到这边来喝一杯吧。”

说着,便骨碌地把椅子转了过来,冲着茶加入漫谈的伙伴。我问他:

“先生，昨天你去了哪里？”

先生就说：

“老版，昨天到大马路 Cathy Hotel 去看一个英国人。”

“可是，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就马上去搭电梯，那晓得司机的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吧，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于是乎说‘走出去！’

“终于被赶出了电梯。”

“那才怪呢！后来先生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层楼；于是乎碰见了目的的人，谈了两个小时光景的话，回来的时候，那英国人送我到电梯上。恰巧，停下来的正是刚才的那一部电梯。

“英国人非常殷勤，所以这次没有赶出我，不，不是的，那个司机非常窘呢——哈哈哈哈哈……”

听了这些话我就想道：头发翘耸耸地养到一寸多，简直像百日鬘^①的形状。脸上蓬蓬的蓄着随便胡子。随随便便地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穿着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只有一双眼睛放射着异样的光彩。以这样子的神气跳进上海屈指的豪华旅馆的电梯，因而司机的没办法起来，也不是讲不过去的事。虽说是他赶出他，可是马上说错在他身上而加以责备，又奈何呢？毋宁说那窘住了的司机，倒未免觉得有点可怜，想寄他一点微微的同情起来了。

“老版，《泰山》来了，去看看。听说非常有趣的呢。我同你大概是没有机会到非洲的山中去的了。不去看一点电影之类吗？”

“老版，你晓不晓得这个？这个，是广东产的，叫‘黄皮’，只有指头这么大，却确是橘子的一类。不过和金橘味道却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他说着这一类的话，常常拿珍奇的东西来给我们。心里正在想“是

^① 鬘是假发的意思，百日鬘者，是戏子戴在头上扮演乞丐或囚徒之类的一种假发。——译者

这样的吗？”他却又说：

“老版，对本国人扯的谎，是罪恶，不过从外国受到强大压迫的时候，对那压迫者扯的谎，却决不是不道德的。”

我的神经常常被他这种意义深刻而内容非常明了的话切切地刺激着。

“现在中国的文化运动里面，有一个大的艺术运动，那就是黑与白的木刻。”

先生老早就注意到这木刻，他远远地从英，俄，德，法，日各国收集了许多木刻。那数目实在总达到好几百件的吧。我曾经向先生拜借来开过三四次展览会，每一次都有四五百参观者。

仿佛是一九三一年(?)吧。当夏季炎热的时候，上海第一次的，不，怕是全中国第一次的木刻速修讲习会，仗先生一个人的力量开成了。那时因了某种情形，连那仅是极短期间的一星期，也是突然的，所以什么准备也没有，譬如刀！也只把钢笔头的屁股磨一磨，装上钢笔杆，就这么在现成的木板上刻着。

从召集学生以至每日的口译，统统是先生一个人干的。听讲的只有十三个人。那小小的发生是可惊的，它便是今日风靡全中国的木刻艺术。

先生一方面移植西洋派的木刻，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特有的古代木刻艺术中优良作品的存在，并且痛心着它的日趋灭亡；于是与郑振铎氏相商，要想保存它；其排除万难而作成的，便是那《北平笺谱》。《北平笺谱》有六卷，是合计有四百种诗笺的搜集；仅印了二百部。英，法，俄，日各国的图书馆，各寄赠了一部去；德国和意大利，他说：“法西斯蒂的国里似乎用不着文化的，所以不给。”终于没有送。

《北平笺谱》之后，又计划翻印《十竹斋笺谱》，那也是和郑振铎氏协力着手的。第一卷已粗装出版；因了郑氏的离开北平，第二卷也就见不着了。

先生终于未见完成而故世了。我希望郑氏继续先生的意志，尽力务使它完成。

我一写漫谈，他便说：

“老版，你的漫谈太偏于写中国的优点了，那是不行的。那么样，不但会滋长中国人的自负的根性，还要使革命后退，所以是不行的。老版哪，我反对。”

责备我的先生，屡次，不老是毫不顾忌地暴露中国的现实；因此，其遭到一部分人的反感，也决不是少见的事。

然而，先生的现实暴露，并不是为了写文章；他当然不是以暴露现实为快的轻薄者，也不是为暴露而暴露的人。

在先生的现实暴露中，流贯着脉脉无尽的热血。

“恰如父母对孩子的痛斥，是与热泪俱下的鞭子。”

唯有先生的暴露，才真是从伟大的爱发出来的奔流，是给中国民族的警世名言。

不但看了下鞭子的文章，还当面看到鞭泪同下的先生的这个我，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我明白先生的感情，只是因为怕会减弱他的鞭子的力量而守着缄默罢了。

我讲到中国民族富于悠久性的一点，只要稍微说了一点乐观的话，先生马上便要说：

“老版，我反对，是非常悲观的。”立刻在我头脑上压上一个烙印。

“中国的将来，如同阿拉伯的沙漠，所以我要斗争。”

他对我这么说，那实在是撕裂肺腑的沉痛之言。无限制的蒙古沙漠，一阵凶似一阵地拥到那清澄之极的眼中来。面着那沙漠衣而无衣，食而无食的一国的民族，每个人的枯枝似的手臂上，都棱棱地梗起了粗大的血管，握着最后的武器的一双空拳，在仇恨那凜然扫压过来的滚滚沙尘。凄惨的饥饿大众，历历犹在他目前。这是我所痛憾的。

“老版，此番我睡了三个月，细细想过了。

“中国四万万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

“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

“然而，弄到现在这样的不认真，其中当然是有该同情和该愤慨的距离的；

“不过，要肯定现在的不认真的生活态度，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又想到日本的八千万人民。